

在认识革命中重塑“文学”

——论李初梨“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理论的思路与影响

王 健

内容提要 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李初梨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理论因其“认识革命”的思路而具有特殊意义。李初梨的理论并不直接指向政体革命，而是勾勒出以“全社会”视野为核心的认识体系，并转换了智识阶级对革命的认同方式，从这两个层面将无产阶级革命的概念和问题带进文学中，为国内马克思主义从政治理论到文学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契机。在当下，其思路仍具有可观的理论潜能，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普罗列塔利亚；认识革命；日本马克思主义；全社会；智识阶级

谈及1928年的普罗文学，当下学者往往将其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并立足于“五四”乃至新时期之后“文学独立”和“人的自觉”的标准对其进行批判，比如认为李初梨主张的“文学为政治服务”会遮蔽文学的独立性。这些批判固然有价值，但不利于进一步推进对普罗文学的历史化研究。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尝试超越这些标准，为李初梨的探索正名，比如周惠忠、旷新年、安涛等，他们还原了普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复杂联系，但也遗留了较多问题：首先是普遍较为简单地处理了李初梨与日本理论的继承关系，认为他的问题根源于日本理论的“左倾”，而缺少对其理论在国内的运用的辨析；其次是将普罗文学笼统地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环节来审视，侧重它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以及之后与现实主义乃至毛泽东延安讲话重叠的部分，却往往将李初梨等人和太阳社的理论混淆在一起，对普罗文学在国内革命问题上的探索的独特性重视不够。本文旨在从“革命文学”的发生语境着眼，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理论区别入手，以李初梨的作品为核心来辨析普罗文学的具体思路，探索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贡献，继而审视普罗文学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 革命路径的转换

1927年10月，李初梨一行人放弃学业从日本回到上海时，是心怀盗火者梦想的。多年后冯乃超仍能回忆起在东京看到李初梨演讲时的场景：“对象可能是日本听众。李用日语讲演，最后一句话是：‘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将因中国无产阶级的血染得更加鲜红。’”^[1] 时值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左翼团体都汇聚到上海来展开自己的探索，这也是新一轮“革命文学”讨论兴起的背景。为避免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也为了在陷入混乱的“革命”语义中明确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李初梨等人引入了日本流行的“普罗列塔利亚文学”概念。

由于受到成仿吾的邀请，李初梨等人进入了创造社。创造社此时更像是个文化商业机构，有自己的出版社，能发行自己的杂志，在周全平、叶灵凤等“小伙伴”的努力下，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商业运营机制。为避免因彼此不熟悉而造成相互掣肘，成仿吾在创造社原有成员和新进人员之间画了一条线，彼此独立办公，这种隔离被另一位创造社元老王独清认为是“很不好的工作”^[2]。关于新班子的

分工，郑伯奇的回忆是：“初梨和乃超负责文艺理论和批评，彭康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镜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分析国际形势。李铁声也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翻译和介绍工作。”^[3]接下来这群成员认为，原有的杂志不足以代表“新的阶段”，便停止了和鲁迅商议恢复《创造周刊》的计划，转而创办新杂志《文化批判》。于是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朱镜我、冯乃超任编辑，成仿吾在《祝词》中豪言：“《文化批判》将贡献全部的革命的理论，将给与革命的全战线以朗朗的光火。”^[4]他们尝试将大革命时期出现的“革命文学”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方向上来，创造社的马列理论宣传战就这样打响了。

创造社并非唯一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组织，他们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方针的调整撞在了一起：太阳社在李初梨进入创造社前不久成立，成员多有党员作家的身份，他们同样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创造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是伴随着与太阳社的冲突而开展的。关于太阳社的创办，钱杏邨的回忆是：

邓中夏和李立三都知道我们几人喜爱文艺，也鼓励过我们。特别是邓中夏，他也爱好文学，支持我们提倡革命文学。蒋光慈那时也从上海到了武汉。我们曾商量成立党的文学组织，其实就是酝酿太阳社。汪精卫叛变后就停了。党叫我们分头去上海。^[5]

苏联虽然在1923年爆发文艺论战时就已开始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但驻中国代表鲍罗廷一直到1926年强调的仍然是政治和军事的革命。“革命文学”概念虽流传到国内，其意义仍然多被政治与军事的革命所同化，被理解为描写政治革命或军事革命的文学。虽然郭沫若、成仿吾等对这个概念有所思考^[6]，却没有形成专门的文化宣传团体，也未能形成更为清晰的认识体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建构是“革命文学”中的二次革命，无产阶级文学社团的建立也是中共领导层调整革命思路的结果。

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未能重点抓文学的原因，泓峻、付甜甜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面临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势，迫切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培养出能够立即领导革命的职业革命家以及政

治素质过硬的革命队伍，因此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组织建设以及组织工人运动上面。”^[7]这个解释相对合理，文学未受重视一方面有国内革命形势的原因，另一方面也与国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接受方式有关。20世纪20年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主要集中在经列宁和斯大林改造的、强调夺取并改造政体的内容，这和马林、鲍罗廷代表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在这种政体革命的认识中，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承担了革命的任务，对无产阶级的认识问题往往是放在建构无产阶级政府的问题中去讨论的。改版后的《新青年》宣传的多为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李大钊等先贤，瞿秋白、郑超麟等人更加重视政治经济层面的内容，由此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往往与文学关联不大，甚至会与之形成对抗。曾任《新青年》主编的彭述之便对瞿秋白等人在文章中偶尔展露的文艺姿态感到气愤，认为：“我们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变成普通的无聊的空谈哲学文学的杂志了！”^[8]这一倾向在郑超麟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支部领导并不明白地反对文学，却鄙视文学青年，以为这些人不能成为好同志。”^[9]究其缘由，也是因为在职体革命的影响下，革命群体将夺取国家机器这种能直接改变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革命形式视为正途，认为文学对此帮助有限，其“空谈”甚至会对革命造成不利影响。

大革命失败、鲍罗廷回国让政体革命的推进接连受挫，共产党参与政体构建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挤压。面对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宣传，共产党背负着为无产阶级革命正名和对自身革命方式进行反思的双重压力。第一项任务表现为在“革命文学”的认识论战场中，革命者要将复杂的革命话语引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向上来。太阳社的党员作家们需要去国民革命之伪而存无产阶级革命之真，蒋光慈就明确指出，“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10]。第二项任务表现为对“革命如何进行”问题的反思。无论革命对象是资本主义还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大革命时期联合国民党进行政体革命的路线均被视为机会主义给否定掉了，革命者们需要重新探索革命的依靠对象与推进形式，由此形成的讨论可延伸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党内知识分

子与陈独秀为首的“取消派”、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的思想论战。这些都是创造社参与“革命文学”讨论的背景，对革命的不同反思和探索也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阐释，其影响首先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大幅扩容的现象：除了托洛茨基、斯大林、普列汉诺夫等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国内通行外，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也风靡一时。其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疆域大幅拓展了。当马克思主义理论离开了政体革命的领域，试图在社会中宣传和探索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式时，就不得不更多依靠报刊与杂志等宣传媒介了，这就大大增加了与文学相遇的几率。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从政体向思想的拓展，创造社和太阳社都与“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传统发生了碰撞。与政体革命相区别的是，五四时期这种以文学为载体的认识革命是社会自下而上来进行的，它们所构想的政治往往超越于现实，杨念群对无政府主义的判断比较契合其特点：“个人自由的绝对目标不是抽象地谈论人身肉体如何摆脱束缚达于解放，而是重构个人与社会新型关系的基础上，破除压抑性权威，创造新鲜的生活。”^[11]他们构想的个体并非孤立，而是能够形成未来社会秩序的理想主体，他们对试图重构政体的暴力革命并不重视，而是倡导将更高的革命理想建立在个体的认识改造层面，由此生长出不同于现实却更加稳定的未来政治。因此，他们对大革命时期形成的“革命文学”往往持保留态度，大革命失败后，“文学革命”的坚守者更是游离于窃国军阀的政治和话语冲突之外。鲁迅在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反对“瞒与骗”的文学即为例证^[12]，他将认识不断向个体的内心转化，使之成为超越现实的革命手段，这在当时的智识阶级中颇为流行。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而言，如何处理这份“文学革命”遗产、处理个体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冲突，是一个核心问题。

二 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冲击

面对“革命”这一复杂的问题，创造社和太阳社这两个看似处于同一战壕的团体却在1928年爆发了冲突：太阳社仍然保留着依靠无产阶级政党进

行政体革命的意识，党员身份是其立场也是其出发点，他们试图在文学中唤起大众对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关注及情感上的认同，以便配合和支持政党先锋队所推进的政体革命。基于这类想法，太阳社成员们回头审视仍处于“文学革命”脉络中的文学，就觉得不合时宜了。蒋光慈提出“文学落后于时代”^[13]的判断，得到了成仿吾、钱杏邨等人的响应。李初梨一方面认同蒋光慈对无产阶级任务以及文学形势的判断，另一方面却将其“表现说”作为自己批判的对象：“在这几段文章里面，除了‘促进’带了几分暧昧的实践的意思而外，其余可惜我发见不着一点实践的意义来。你以为‘同情’，‘希望’，‘信赖’，‘认识’，‘指示’是实践吗？”^[14]他认为蒋光慈的思考无法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推进增色，二人的矛盾也体现出了政体革命与认识革命之间的差异，李初梨源自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此也显示出其特点。

20世纪20年代是日本左翼对文艺问题讨论得较多的时代，青野季吉的文章与《文艺战线》杂志在东京的校园里风靡一时。李初梨等人也多为东京帝大的留学生。冯乃超回忆道：

当时，人们的马列主义的水平是不高的，对真假马列主义还不大能分辨清楚。例如，有一家书店，竟把布哈林的文章和斯大林的文章合在一起出了选集（编辑者还是日本共产党的领袖佐野学）。我们也在“哲学研究会”的小组中集体读过德波林的著作；就是托洛茨基的书，我们也读的。^[15]

这些回忆虽带有事后的价值判断，但也能看出他们在日本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与国内的不同，这并非用“误读现象严重”^[16]的判断就能概括：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更符合“革命文学”意识形态的要求，是由于认识革命在日本与苏联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由于不能像苏联一样掌控国家机器，日本左翼重新解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更加强调后者的反作用力，试图通过意识的革命带动国家机器的变革，福本和夫、青野季吉等都是认识领域为战场的。斋藤敏康对福本和夫理论的阐述是：“第一，阶级意识（它是通过和斗争的相互作用，向逐步完成的某一阶段的思想革命的

飞跃);第二,经济的斗争;第三,政治的斗争(向某一阶段的政治革命飞跃);第四,经济革命(即利用政治革命逐步完成经济革命)。”^[17]这种从意识出发的革命逻辑给当时的革命者造成了较大的冲击:如果说苏联马克思主义是致力于直接的国家革命,从政体建构出发来思考文学如何与之配合的问题,那么李初梨带来的日本理论则回应了无法直接操控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问题,这在1927年的中国有着较强的借鉴意义。

平林初之辅在1922年对普罗文艺的说法是:“普罗文艺运动,与其说是文艺运动,不如说首先是该阶级的运动。因此它的纲领,不是文艺的纲领,而是普罗塔利亚自身的纲领。普罗塔利亚的解放,是文艺运动的唯一纲领。”^[18]在这里,文学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环节,普罗文学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阶级认识带向个体,继而刺激个体将革命认识转化为革命行动,与苏联所引导的全球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革命浪潮相呼应。

李初梨一开始并没有党员身份,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提倡在现实和理论上都与政党革命并无直接瓜葛,这一点在郑伯奇“完全出于自发,最初没有得到党的正确领导”^[19]的评判中能得到印证。虽然有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目标,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以及不同的探索形成了李初梨等创造社后期成员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理论内部的差异:两个团体都借助对鲁迅的批评展开论述,但他们对阶级概念的不同思考形成了批评鲁迅时的不同侧重点。钱杏邨认为阿Q的时代已经死去,时代的浪潮已经淹没了鲁迅的思考:“我们目击政治思想一次一次的从崭新变为陈旧,我们看见许多的政治中心人物抓不住时代,一个一个被时代的巨涛卷没……”^[20]钱杏邨的共产党员身份使他更在意现实中无产阶级政党对政体革命的推进形势,并将此视为文学需要去跟上的现实——而鲁迅是游离于这些现实之外的,因此他“没有法跟上时代”^[21]。此时的太阳社除了要辨析无产阶级革命的意图之外,还试图肩负起纯化无产阶级革命、去除小资产阶级不良影响的任务。在他们看来经济上的小有产者会形成其政治上的动摇性,太阳社要做的就是借助文化批判将小资产者政治上摇摆的面目揭示出

来,使无产阶级革命远离其害,并将大众高涨的“革命情绪”转化为对无产阶级政党革命的理解与支持。这些思考与鲁迅的内在革命思路相悖,而其基于政党革命的考虑也与李初梨不同。

李初梨同样关注阶级问题,但更注重社会认识本身。后来他在对普罗文学作总结时说:“所以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作家,应该把一切社会的生活现象,拉来放在他批判的俎上,他不仅应该写工人农民,同时亦应该写资本家,小市民,地主豪绅……”^[22]他引入阶级概念时强调的是对全社会的认识,认为这是普罗文学的核心要义,这也构成了他批判文学界“向内转”现象的标准——对于李初梨而言,所有涉及个体情绪的书写统统都被视为“向内转”:他没有刻意去辨别鲁迅的内在革命意图,以及蒋光慈的“表现”指向什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观念统统导向同一结局,那就是囿于自身的“趣味”而无法看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联系,不能对自身所处的社会位置进行有效把握,因此也就无法形成能够改变社会整体结构的有效实践。李初梨对鲁迅的批评核心在于认识本身,他认为鲁迅无法理解普罗文学对全社会意识的追寻,因此也就无法理解普罗文学斗争的合理性:“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拒抗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斗争,他方面,消极地,固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维持,为布鲁乔亚氾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23]对李初梨而言,阶级认识的局限就是革命的局限,需要粉碎鲁迅式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才能获得基于对全社会的理解的革命意识,因此需要批判的是鲁迅的阶级认识而非阶级身份。

李初梨的“普罗文学”与五四“文学革命”都强调将认识作为起点和基点,但李初梨通过阶级概念引入的是对社会构成进行全面把握的意识,并将此视为转换“文学革命”中个体认识的资源:在他看来,文学需要表现的人是社会中存在的人而非理论中被均质化的个体,阶级视野强调的是个体对自身在社会中所处位置的认识。他尝试将均质化的个体变成社会中生存的阶级个体,将个体革命变为社会中的阶级革命。李初梨从这个角度引入了辛克莱尔“一切的艺术,都是宣传”的论点,认为普罗文

学的认识目标，就在于让读者对其在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有所了解，从而形成革命的意识与目标并转化为革命的实践：“为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的使命，不是以观照的——表现的态度，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斗争的文学。”^[24]这种由意识斗争生长出来的实践不局限于以政体变革为目标的政党革命，不只包括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宣传，还在个体层面上将一切基于对全社会的认识而形成的、能改变社会结构的尝试都视为斗争的组成部分。因为与“文学革命”一样都是立足个体的，李初梨更容易回应“煽动家”们对他们不直接参加暴力革命的挖苦，在他看来，认识革命的“挖墙脚”与暴力革命的“揭屋顶”都是革命的办法^[25]。日本左翼学者在1926年重建共产党并形成了颇为繁荣的无产阶级文学争鸣气象，这也为李初梨提供了思路与信心。

创造社和太阳社的争论源自对革命方式的不同思考：对全社会意识的强调是李初梨批评太阳社的依据，他认为太阳社过于片面地看待革命与无产阶级了，因此无法形成相互联系的全社会意识。而太阳社则认为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不了解无产阶级革命形势而妄谈革命，是纸上谈兵的“抄书的主犯”^[26]。双方的冲突其实是由于彼此不了解对方的思路。不过很快，二者在党的干预下开始团结。创造社与太阳社在1928年4月上旬就开始了联谊的活动，交流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认识。虽然相互攻讦也是有的，但二者毕竟开始了相互融合的进程：太阳社学习普罗文学，钱杏邨翻译了青野季吉的文章；李初梨也在不久后译出了德博林的《唯物辩证法精要》（《文化批判》1928年第5期）、塞拉菲莫维奇的《高尔基是同我们一道吗》（《创造月刊》1928年8月10日）等文章，逐渐融入苏联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号召当中。创造社的一些骨干成员也在这一时期先后入党。

三 智识阶级的革命“实践”

与太阳社关系逐渐缓和的同时，创造社的内部却趋于分裂：随着革命形势的紧张，部分成员从商业机制出发担心李初梨等人过于激进的革命理论会

让整个集团覆灭，但彼此不同的理念又因内部的独立办公而难以沟通。被视为小资作家的创造社成员张资平曾去旁听过李初梨等人和太阳社的讨论，期间因故离开，他给出的解释是孩子被“闹昏了”，但这一行为却给在场者留下了不快。张资平出去后门没关好，冯乃超便“恨恨地伸出只脚踢那扇门，关回去了”^[27]。在1929年下半年，创造社内部的冲突甚至强于他们与其他社团的冲突了。

在内忧逐渐显现之时，李初梨等人对梁实秋、茅盾等人的批评也引发了更多的争议，不过他们所主张的普罗文学的革命逻辑也在这些争论中展示得更加清楚。和中共高层及太阳社的党员作家相接触并了解国内政治动态后，李初梨便有意识将文学中的意识批判与革命任务中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进一步结合起来，尝试为厘清革命中的“机会主义”出份力。由于对福本和夫“分离结合”理论的继承，也由于对国内革命形势的了解，李初梨对革命文学历史脉络的理解已与太阳社趋于一致，他也认为小资产阶级倡导的“文学革命”在五四时期承担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他们因为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将此事进一步推进，甚至为了自保而放弃革命。李初梨尝试着统一认识革命和政党革命，他需要在革命文学的论争中解释无产阶级革命应当由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李初梨的革命思路并没有因1928年的入党而发生变化，他对自己的经验仍然自信：革命首先需要对社会有正确认识，然后才能形成革命的有效实践。基于这种认识，在回答革命由谁来做的问题时，他与太阳社的观点仍然有差异：在转变“文学革命”的认识逻辑时，他们都尝试借阶级概念将个体—集体的逻辑变成群体—集体。不过这个承担革命任务的群体，李初梨选择的是智识阶级而非政党，他将此作为扬弃个体、通向集体的枢纽，这个思路在他随后的《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这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更多阐释。对于李初梨而言，普罗文学并非产生于被压迫的劳苦大众，而是源自智识阶级对“全生活过程”的认识和批判：

智识阶级则反是，这一个阶级的特点，就是他广泛地生活于政治过程及意识过程，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面，还可以接近物质的生产过程，同时也能有批判它的生活要求，所以他批判的领域，可以说是及于全生活过程了，有了这种全生活过程底批判，才能发生社会主义的意识；有了这种“意识的要素”的参加，劳动者阶级才能汲取真正的全无产阶级意识。^[28]

因此智识阶级在探索革命路径的进程中尤为重要，他们因更易获得革命的目的意识而能够更好地充当革命向导的角色。在李初梨看来，现实的阶级冲突尖锐化后发生的斗争并非革命，只有让这些冲突变成能够改变社会秩序的实践，才能形成革命，他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中如是说：

我以为一个先锋的任务，是要把大众自然生长的要素，结合于他的目的意识；绝不是单单地只去听大众的自然生长的声音。如果要真是这样，那就是对于自然生长的屈服，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29]

李初梨是支持政党革命的，但他认为只有具有目的意识才能让革命更加有效，而形成和普及这种目的意识性则需要依靠智识阶级。因此，李初梨不断强调批判的重要性，将其作为智识阶级调整和丰富自身、打破阶级局限而获得革命意识的手段——这不仅表现在他对鲁迅、茅盾的批判以及他与郭沫若关于留声机问题的争论中，还体现在他与钱杏邨关于蒋光慈的争论中。

智识阶级一旦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中介群体，其与大众的关系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李初梨对认识革命的强调导致他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有其特色，虽然他认同对大众进行政党层面的动员和组织工作，但更强调智识阶级在认识层面的纠正与输出任务，他主张通过理论斗争完善智识阶级的中坚力量，使之自觉承担起将革命意识推广到普罗大众当中并指导政体革命的工作。因此，李初梨强调的能动性是智识阶级的认识—实践能动性：它首先表现为群体的自我调节，其次是更为自觉地推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推进普罗文学由智识阶级到普罗大众、由认识革命到政党革命、由国内到国际的拓

展。智识阶级此时在理论上增强自我是为了在最终的社会秩序重建中消弭自我，这个悖论展开的进程即被视为普罗文学的推进过程。借助对革命目标的社会性视野的转换，普罗文学将智识阶级从政党政治的旁观者变成认识革命的负责人，使之脱离了政体革命中阶级身份的尴尬。随着智识阶级任务的转变，马克思主义也得以从政治经济学扩展到人文学科。这些都不只是李初梨对青野季吉理论单纯的复制，而是他面对国内革命形势，对日本的认识革命的创造性转换与展开。

在解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由谁来承担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应该怎么做？对于李初梨而言，问题便是智识阶级的革命实践包括哪些内容？普罗文学的实践是否应该等同于作家的写作？李初梨固然从一开始就不断强调文学的重要性，但侧重的还是作家的观念：“问题不在作品的题材，而在作家的观点。这是我们现在应该强调的。”^[30]他认为认识的价值大于形式表达，对形式的分析也只有讽刺、暴露、鼓动、教导这四点说明，且除了《怎样底建设革命文学》的寥寥数笔外再无专门分析。因此和当时的其他文学理论相比，普罗文学所包含的创作论显然无法支撑其认识论意图，矛盾诟病其为标语口号文学似乎也无厚非，这些问题也成了后世坚持文学独立的学者批评他们的重要根据。这些批评固然点出了李初梨的问题，但过于简单的否定很容易遮蔽掉其理论原初的历史意图，也忽略掉其真正困境。

李初梨忽视形式问题的根源在于他无所不包的“实践”概念，他对智识阶级认识—实践的强调，使这个群体承担起了比文学写作更加广泛的革命责任。在当时革命千变万化的形势中，李初梨需要在文学领域内完成政治未完成的目标。因此智识阶级的任务不仅仅止于文学创作，还在于实现阶级革命的目标，需要用目标规范文学创作和政党革命这两种手段，但实现目标的实践并不局限于这两种手段。因此，李初梨挖苦鲁迅“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31]这一看法，讽刺茅盾总是流连于“诉苦”，认为这是他们阶级局限性的表现。对于李初梨，智识阶级肩负的是辨析无产阶级革命意识、探索其革命手段的责任，因此

他们需要借助不断的批判和自我批判来扩展认识，将革命认识转换为革命实践，而不是在自己的视野中固步自封。因此李初梨不断批判小资，不停地否定他们观点的“错误”，但这种过于激进的否定反倒会让智识阶级失却其实际上擅长的手段而无所适从。当否定成为削弱而非扩充认识的手段时，普罗文学所期待的实践也就无法达成，最终其认识革命的理想只能在平面的相互否定中不断被消磨。李初梨所提倡的实践虽然丰富了革命的方式，却和以往的文学写作实践形成了错位。相比之下，太阳社虽也有问题，但在创作论的层面上却更能获得作家欢迎，这也让革命文学在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化时保留了更多弹性。

到了1928年底，李初梨等人因为编辑问题与王独清等人的矛盾越来越深，王曾对张资平说：“他们迟早是要排斥我们的。他们（指冯李朱等）先要打倒你，其次打倒我，最后打倒仿吾。”^[32]成仿吾的离开更加剧了创造社内部的分裂，甚至李初梨搬家时想在创造社申请资金，都因王独清的阻拦而搁浅^[33]。内忧外患中的创造社最终在1929年2月被查封。失去舆论阵地后，李初梨也转向了实际的革命组织工作，却在1931年和彭康先后被捕，创造社的革命实践也因折损了两个核心人物而一蹶不振。“左联”成立后，认识革命也慢慢淡出了“革命文学”的理论视野。不过，实验终结并不意味着李初梨认为自己的探索错了，他在1937年出狱去延安后撰写的《十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检讨》一文中，仍是对自己的普罗文学理论抱有信心，并将1927年视为革命的新起点。

四 “普罗列塔利亚”何以改变“文学”

概言之，李初梨借助日本的经验将马克思主义导入认识革命的领域，拓展了新的革命思路。普罗文学理论促使革命文学往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也促使智识阶级在政体革命和认识革命当中成为更为主动的角色。尽管李初梨等创造社成员的探索充满了书生意气，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形成并非他们独自的功劳，但他们的探索的可贵之处在于为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新的问题，改变了人们对马

克思主义乃至文学的理解方式。

首先，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拓展到了更广的认识领域。在“革命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转向中，国内形成了更为体系化也更为精巧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也反过来重塑了对文学的认识与建构。普罗文学所提出的超越个体的全社会视野在文学的认识中开始落地生根，李初梨将此视为转变基于个体认识的写实主义的依据^[34]。这种观念带动了国内文学理论从写实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向，从而将对文学的思考从个体移向集体，从经验移向唯物主义。这些变化催生了新的文学观念，逐渐形成了能够转变“文学革命”体系的力量。

其次，李初梨的认识革命也拓展了智识阶级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参与空间。其价值不仅在于刺激了郭沫若、茅盾的自我反思和“挤”鲁迅“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35]，更重要的是李初梨将革命的目的意识性作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话题提了出来，在无产阶级革命中为智识阶级赋予了新的价值。在1930年《拓荒者》杂志上刊载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宣言中就有这样的表达：“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36]认识革命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生长空间，也拓展了智识阶级参与革命的机会，更多的问题也随之呈现了出来，包括革命的推进中智识阶级与政党的配合问题、革命宣传中智识阶级与大众的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又进一步触发了智识阶级对文艺大众化、个人反抗和群体反抗如何结合等问题的思考。这些讨论不仅与后来共产党所提出的“两个战场”的思路能够呼应，也留下了“罗曼蒂克”这个在革命中始终存在却难以克服的问题^[37]。但也正是在对这些新问题的回应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生长出了更为丰富的形态，并在后来的革命语境中不断调整，从理论建构和创作实践两个维度逐渐构建出新的文学体系。

文学理论的变化源自认识论领域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与李初梨等人所探索的认识

革命联系紧密。在他们这里，由阶级带来的全社会视野是理论核心，阶级概念并不像后来那样局限于政治身份的区隔。重新审视普罗文学中蕴含的理论潜能，对我们理解过往的革命史以及构建更能适应当下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

[1] 冯乃超：《鲁迅与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饶鸿兢等编，第90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 王独清：《创造社——我和它的始终与它底总账》（摘录），《创造社资料》（下），饶鸿兢等编，第677页。

[3][19] 郑伯奇：《创造社后期的革命文学活动》，《创造社资料》（下），饶鸿兢等编，第876页，第879页。

[4] 成仿吾：《祝词》，《文化批判》1928年创刊号。

[5] 吴泰昌：《阿英忆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6] 参见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第3期；成仿吾《革命文学与他的永远性》，《创造月刊》1926年第4期。

[7] 泓峻、付甜甜：《中国“左翼”文艺战线形成的历史过程》，《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

[8] 郑超麟：《K.U.T.V.》，《郑超麟回忆录》上卷，第20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9] 郑超麟：《谈蒋光赤》，《郑超麟回忆录》下卷，第339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10]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1928年第2期。

[11] 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第1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

[12] 鲁迅：《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第1卷，第25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 蒋光慈：《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太阳月刊》1927年创刊号。

[14] 李初梨：《一封公开信的回答》，《文化批判》1928年第3期。

[15] 冯乃超、蒋锡金：《革命文学论争·鲁迅·左翼作家联盟——我的一些回忆》，《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3期。

[16] 黄念然、高越：《日本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

化》，《长江学术》2017年第2期。

[17] 斋藤敏康：《福本主义对李初梨的影响——创造社“革命文学”理论的发展》，刘平译，程广林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

[18] 平林初之辅：《文艺运动与劳工运动》，转引自刘静《论日本普罗文学运动》，《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20][21] 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太阳月刊》1928年第3期。

[22][30][34] 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创造月刊》1929年第2期。

[23]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答鲁迅〈“醉眼”中的朦胧〉》，《文化批判》1928年第4期。

[24][25]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8年第2期。

[26][27][32][33] 张资平：《读〈创造社〉》，《创造社资料》（下），饶鸿兢等编，第692页，第692页，第690页，第696页。

[28][29]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思想》1928年第2期。

[31]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第20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5] 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6]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马良春、张大明编，第13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37] 范伟：《“革命的罗曼蒂克”：从情的飞扬到观念论的魔床》，《中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高华鑫